

对以色列基布兹模式的历史考察及思考

丛日云 马 涛

内容提要 基布兹作为以色列社会中微型、小众、独立、自治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实验,是犹太锡安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理想相结合的产物。基布兹之所以维持百年并获得相当的成功有其特殊性,具体包括:共同体规模很小、属于自愿的小众模式、保持独立和实行直接民主等自身优势,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产生的生存压力和集体互助需求、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等有利的外部社会大环境,以及犹太民族集体主义宗教文化传统的支撑。但是,基布兹的集体主义模式有明显的局限性,它与当代复杂的社会经济机制、人性的自利动机和个人主义潮流之间存在张力,并最终引发基布兹模式的危机与变革。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大部分基布兹改弦易辙,通过融入个人主义原则,从严格的共产主义公社向着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集体合作经济模式转型,成为以色列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群岛。

关键词 基布兹 共产主义 乌托邦主义 锡安主义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20.02.010

自古以来,人类对人人平等、完美和谐的乌托邦社会的向往构成一个不绝如缕的思想传统,受到人类构思出来的乌托邦蓝图的激励勇敢地进行实验的也不乏其人,但基本都是以失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当人们看到犹太人创建的基布兹获得相当的成功时,则普遍感到非常意外和惊奇。基布兹作为一种微型、小众、独立、自治的共产主义公社体系^①,能够维持上百年并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是如何做到的?这套公社体系的独特性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历史传统、宗教文化、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使其获得成功?其固有的局限性与进行改革的原因是什么?思考这些问题的意义,远远超过这一具体现象本身。

一、基布兹模式的特点

“基布兹”(kibbutz)在希伯来语中是“聚集”的意思。犹太人历史上就有“聚集”的传统。在

国家灭亡后近 2000 年的大流散期间,犹太人被迫散居于地中海周围的世界,为了维护其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由此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使自身不至于被周围民族所“溶解”,也由于常被周围民族所排斥,他们常采取聚居的形式,在各民族的夹缝中形成一个个微型的“隔都”(ghetto)。但这种犹太人社区只是守望相助的宗教和文化共同体,带有宗教社团的色彩,与共产主义公社相去甚远。19 世纪末期,流行于欧洲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浪漫主义思潮合流,刺激了犹太复国主义即政治锡安主义(Political Zionism)的兴起。锡安主义运动的主流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其中一些较为激进的犹太青年厌恶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怀着对自然、土地、劳动、平等与和谐

^① Fred Skolnik (ed.), *Encyclopedia Judaica*, second edition, Vol. 12,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House Ltd., 2007, p. 121.

生活的渴望,在移居巴勒斯坦时,选择了基布兹即共产主义公社的社会组织模式和生活方式,由此发起了一场持续上百年的“基布兹运动”,进行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共产主义公社实验,使其成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定居模式之一。

从1910年德加尼亚(Degania)的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基布兹发生变革之前,这场持续70多年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实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基布兹不仅做到了自给自足,为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生活模式,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社会和以色列国家的建立与建设,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那么,这种独一无二的基布兹模式具有怎样的特别之处呢?

基布兹是一种“新社会”(new society)或“新的生活方式”,^①这种“新”充分体现在其共产主义特征上。经典的基布兹模式始终坚持财产公有、集体劳动、按需分配、共同消费、人人平等和民主自治原则,并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贯彻集体主义精神,追求统一和谐,符合历史上乌托邦主义理想的一般特征。^② 具体来说:

第一,基布兹是公社性质的小规模甚至微型共同体。在基布兹模式的初建时期,一般只有十多个人组成的公社,后来定型的基布兹,较小的人口不过数十人,最大的人口1000余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所有的基布兹都逐渐扩大了自身规模,但平均人数只有60—110人。建国后,基布兹的数量和人口都大为增加,但是单个基布兹的人口大体在100—1500人之间,平均每个300—500人。20世纪80年代改革以后,基布兹人口有较大变动,但小规模共同体的特征没有根本变化,始终保持着平均每个基布兹500多人的规模。^③

第二,基布兹是实行平等参与、直接民主、自治的政治共同体。成员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通过直接参与的方式决定基布兹的共同事务。基布兹设置了一系列民主机制,其核心是全体成员大会、由成员大会选举组成的具有任期的各种委员会和执行机构秘书处。成员大会一周召开一次,所有基布兹的成年人都是成员大会的一员,有权利就涉及自身和基布兹的各种事务进行讨论和作出决策,基布兹的重大事项需要全体成员的

75%参加投票,且投票者的2/3多数同意才能通过。这种家庭式的亲密公社和切实的直接民主机制,保证了基布兹的民主自治真实高效。^④

第三,基布兹坚持财产公有,自我劳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这是基布兹区别于以色列其他定居模式的核心要素。基布兹的建立者从一开始就怀着共产主义梦想来到巴勒斯坦,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充满正义和友爱精神的社会,不少基布兹的领袖都有过俄国革命的经历或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⑤ 他们所建立的新社会“在文化和民族性上是犹太的,在组织结构上是社会主义的”^⑥。成员集体劳动,所有收入归基布兹共同所有,成员按需要从集体中获得生活必需品和服务。基布兹的先驱们希望实现犹太人与土地的再结合,建立人人劳动、以劳动为荣、不受监督、没有剥削、不依靠犹太慈善家救济、不受犹太管理机构或农场管理者严格监督的劳动共同体。所以,基布兹依靠自我劳动,也反对雇佣非犹太人即阿拉伯劳工。崇尚劳动特别是农业劳动成为基布兹的重要理念。^⑦

第四,基布兹是将集体主义精神贯彻到生活

① Dan Leon, *Kibbutz: A New Way of Life*, London: Pergamon Press Ltd., 1969, p. 27.

② Uriel Leviatan, “Kibbutzim as a Real-life Utopia: Survival Depends on Adherence to Utopian Values”, in *Psychology and Developing Societies*, Vol. 25, No. 2, 2013, pp. 250–257.

③ Henry 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A History, Origins and Growth 1909–1939*,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67–68, 80, 137–138, 189–190; Raymond Russell, Robert Hanneman and Shlomo Getz, *The Renewal of the Kibbutz: From Reform to Transformation*,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2.

④ Ichud Habonim, *A Guide to the Kibbutz*, Tel Aviv: Israel Press Ltd., 1964, pp. 36–37; Amir Helman, “The Israeli Kibbutz as a Socialist Model”, in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JITE) /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Vol. 148, No. 1, pp. 169–170.

⑤ Henry 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A History, Origins and Growth 1909–1939*,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4–25, 31; Walter Laqueur, “The Kibbutz, Post-Utopia”, in *Jewish Review of Books*, Winter 2012.

⑥ Henry Near, “Experiment and Surviv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Kibbutz”,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20, 1985, p. 187.

⑦ Henry 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A History, Origins and Growth 1909–1939*,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7–18.

的每个细节,追求和谐友爱的同伴关系和生活方式的道德共同体。基布兹先驱基于对和谐的集体生活的追求,极大地压缩个人和家庭私生活的空间,将集体生活最大化,在公社内部培养同胞情谊和兄弟友爱关系。在基布兹内部,几乎消灭了货币与商品交换,人们成为一个消费的共同体,不再由财产而相互隔离。基布兹属于所有成员,所有成员都属于基布兹,基布兹几乎包揽了成员生活的全部内容,如住房、食物、衣物、教育、医疗、育儿、养老等各个领域。^①例如,儿童的抚育主要由基布兹负责,父母要与孩子分居,儿童集体在儿童房中就寝;全体成员在公社食堂就餐;衣服由公社发放,甚至洗熨衣服都由基布兹统一负责;基布兹对少年儿童的教育也自成体系;基布兹还创造了丰富的公共文化生活;等等。^②

第五,基布兹是实行成员自愿加入、自觉劳动和自由退出制度的自愿者的共同体。新成员加入须经过资格审查和原有成员的同意,如同古代斯巴达公餐团体一般。每日的劳动通过集体商议后,靠成员自觉完成,没有强制或惩罚机制。基布兹是个高度同质化的“熟人社会”,最大化地降低了懒汉、无公益心者、投机分子的“搭便车”行为,在人人拥有充分政治参与机会的前提下,在充满敌意与危险的生存环境中,基布兹成为一个紧密团结、生死与共的大家庭。在巴勒斯坦建设犹太民族国家的锡安主义,开创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激励基布兹先驱们的意识形态动力。^③任何成员都有权利自己选择退出基布兹,基布兹没有权力强制成员留下。这种自愿加入、自觉劳动和自由退出的机制,保证了基布兹始终是个充满活力和吸引力的地方,也保证了其成员都是真诚地献身于锡安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积极分子。

第六,基布兹是以色列社会中非常小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选择这种模式的犹太人在整个以色列犹太人社会或以色列国家中的占比始终较低。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共建有150个基布兹,总人口达到4.5万,占整个巴勒斯坦犹太人的7.6%,这是基布兹人口的最高占比。建国后的基布兹数量大为增加,但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则逐渐降低。在20世纪50至80年代之间,基布兹数量从214个增加到255个,人口从

6.75万增加到11.12万,但是在以色列犹太人中的占比从5.6%下降到约3%。20世纪90年代改革之后,基布兹数量达到270多个,总人口12.5万,占以色列犹太人中的比例维持在2%左右。2018年,以色列基布兹总人口达到17.91万,在近900万以色列全部人口中占比不超过2%(在666万以色列犹太人中约占2.6%)。^④所以,基布兹始终是以色列社会具有特殊精神追求和心理特质的很小一部分人的自愿选择。

二、基布兹模式的成功因素

在思想史上,乌托邦几乎与空想是同义词,但基布兹则使空想部分地变成了现实,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历史上诸多乌托邦主义实验中,基布兹创造了奇迹。

基布兹在近乎原始的条件之下开垦贫瘠的土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危险的社会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了上百年。基布兹在经济上获得了明显的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它创造了高于以色列社会平均水平的劳动生产率,达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⑤基布兹还是军事防卫组织,在保

① Marvin Greenberg, "Communal Education in Israel", in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 46, No. 1, 1968, pp. 28 - 29.

② Marvin Greenberg, "Communal Education in Israel", in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 46, No. 1, 1968, pp. 29 - 30; Leslie Y. Rabkin, "A Very Special Education: The Israeli Kibbutz", in *Th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Vol. 2, No. 3, 1968, pp. 252 - 256.

③ Dan Leon, *Kibbutz: A New Way of Life*, London: Pergamon Press Ltd., 1969, pp. 77 - 78.

④ Henry 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A History, Origins and Growth 1909 - 1939*,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1 - 34, 67 - 68, 79 - 80, 92 - 93, 137 - 138, 160 - 161, 288 - 290; Yossi Katz, "The Religious Kibbutz Movement and Its Credo, 1935 - 48",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1, No. 2, 1995, pp. 253 - 254; Raymond Russell, Robert Hanneman and Shlomo Getz, *The Renewal of the Kibbutz: From Reform to Transformation*,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2; Walter Laqueur, "The Kibbutz, Post - Utopia", in *Jewish Review of Books*, Winter 2012;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Population -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Israel 2019 - No. 70", see from https://www.cbs.gov.il/he/publications/doclib/2019/2_shtatonpopulation/st02_21x.pdf.

⑤ Uriel Leviatan, "Kibbutzim as a Real - life Utopia: Survival Depends on Adherence to Utopian Values", in *Psychology and Developing Societies*, Vol. 25, No. 2, 2013, pp. 253 - 254.

卫犹太人定居区、争取国家独立、防卫以色列国土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①在20世纪60年代,基布兹人口只占以色列全部犹太人的4%,但基布兹青年却在以色列军官中占到22%。^②同时,基布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承担了重要角色。在以色列建国前,基布兹创建和推动了具有政治觉悟的劳工运动。在建国后的1949年,基布兹成员在以色列国会中的占比高达21.7%,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仍保持在16.7%。^③以色列历史上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都来自基布兹,基布兹为以色列贡献的政治精英远远超过它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为什么基布兹能获得这些奇迹般的成就?这就需要进一步审视基布兹模式的独特性、生存环境和历史文化基础,并从中发现其成功的奥秘。笔者认为,基布兹成功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 自由、自治的小共同体的优势

首先,共同体的狭小规模保证了组织的内部凝聚力,能够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最大限度的统一。在基布兹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并不遥远,两者的关系直接可见,个人的奉献对集体的作用也实实在在。相反,组织规模越大,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越疏远,个人越显得微不足道。从这个角度看,个人与集体是分子与分母的关系,分母越大,分子的相对份量越轻,这会减弱个人的主动性和奉献精神。基布兹的规模恰好使其能够发挥集体协作的优势,同时又能使个人与集体、分子与分母的关系保持在亲密团结、集体互助的范围之内。

其次,自愿加入、团体筛选和自由退出机制,保证了基布兹始终是个具有高度集体主义精神的平等者共同体。基布兹的这种组成方式使其成员普遍具有高度理想主义情怀和集体主义奉献精神。作为以色列社会中非常小众的群体,基布兹是社会上一一些具有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理想,更重视集体归属感和经济安全感而不是个人奋斗和个人成就感、个性表现和个人自由的那些人的自由选择,天然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和凝聚力。基布兹内部机制是高度集体主义的,但在加入和退出上,却又尊重了个人的选择。自由自愿的原则也保证了基布兹在日常运作中不存在强制服从或难以妥协的意识形态斗争。基布兹能够按照民主自治的原则,尽可能诉诸参与、协商和妥协的方式化

解内部矛盾。对于无法解决、难以妥协的意识形态问题,基布兹就按照自由自愿和民主决策的机制,实现组织的“自我分裂”,成员可以自由选择退出原组织而加入新组织,从而保证单个基布兹内部意识形态的完整性,同时,组织之间还有以自愿为基础的“自由联合”机制。

最后,基布兹真实有效的直接民主成为公有制和按需分配制度的重要保障。集体所有制或公有制必须与政治民主相配合,没有民主,公有制和按需分配就是空话,实际上谁掌权,财产就归谁支配,就按谁的意志分配,财产的支配者和分配者实际上就是所有者。只有同时实现权力的公有,财产的公有和公平的分配才是真实的。通过基布兹的参与制民主,通过权力的公有将财产的公有得到落实,即集体中的每个成员对大家的共同事务都能平等参与,公共的事务由公众参与来决定,在此条件下的按需分配能够做到公开和公平。通过平等的参与,成员作为主人的身份得到体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实在、直接、可以感知得到,因此有助于培养成员的集体主义精神,增强成员对集体的认同感、责任感和义务感。小规模组织则是民主自治的有效性的保障。一般而言,组织规模越小,民主制越能发挥作用。反之,规模越大,成员与共同体间的关系越疏远,管理成本越高,必然削弱民主机制,公有制的真实性就会受到损害。

(二) 特定外部环境的型塑与保障作用

首先,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早期危险的社会环境,需要以集体的力量来应对,同时也强化了基布兹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内部凝聚力。基布兹的奠基者来到巴勒斯坦垦荒时,所能获得的土地要么因为土壤贫瘠、气候恶劣而无人耕种,要么因为匪盗横行、军事破坏而被人抛荒。当时的巴勒斯坦处于半无政府状态,阿拉伯人远远多于犹太人,少量犹太人生活于怀有敌意的阿拉伯人中间,需要集

^① Henry 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A History, Volume II, Crisis and Achievement 1939 - 199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 - 25.

^② Dan Leon, *Kibbutz: A New Way of Life*, London: Pergamon Press Ltd., 1969, p. 139.

^③ Henry 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A History, Volume II, Crisis and Achievement 1939 - 199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58 - 259.

体的力量开垦土地、排干沼泽、自我防卫。年轻的犹太青年必须一边在烈日之下劳动,一边防止军事侵扰。^①而且,犹太人近 2000 年的流散生活,使他们长期遭受难民和贱民的苦难,骨子里铭刻着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和集体生存意识。这种环境迫使他们学会了互助、互保、共享,通过建立生产和消费公社,改善每个人的生存境遇。而早期采取个体经营方式的移民大多都失败了,有的不得不离开巴勒斯坦,他们几乎都经历过某种程度的“集体化”阶段,只是不够彻底。基布兹这种高度集体主义的观念和集体生存意识,是犹太人先驱们在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探索出的生存智慧。

其次,以色列的民主法治制度对基布兹的承认和尊重,使得基布兹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得到法律的保障,是基布兹持续存在并且繁荣发展的政治环境。基布兹成员还可以通过政治参与影响以色列的议会结构和政治决策。以色列实行议会民主制度,议会席位按照单一比例代表制分配席位,这有利于小规模政党或利益集团获得议会席位。实际上,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基布兹在以色列国家议会中的席位占比保持在 15.8%—21.7% 之间,对以色列的政治决策发挥着重要的影响。^②以色列国家的议会民主制与基布兹的直接民主制相互兼容,都充分尊重个人的政治自由和权利,都以个人作为国家和基布兹范围内最高权威的来源。基布兹社团与以色列国家并不是你进我退、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兼容关系。基布兹成员不仅是以色列国家的建立者和捍卫者,也是建设者和服务者。他们既是基布兹的一员,也是以色列国家的一员,个人在服务于国家和服务于基布兹之间并不冲突。基布兹支持国家的发展,国家也扶持基布兹的成长。基布兹不会将自己的模式强制推向全国,国家也不会违背基布兹人的意愿取缔或限制它。由于以色列属于多元民主社会,国家权力受到限制和规范,无权任意干预基布兹的内部事务。基布兹在建国前的半无政府状态下的自治在建国后也得以保存,并且由于在民主制下基布兹对国家事务的参与,使历届政府都能给予它们许多优惠政策。这使基布兹在以色列民主法治框架内保持了高度的独立和自治。

最后,基布兹的经济活动与以色列全社会的

市场经济相互衔接,构成了基布兹得以在经济上维系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基布兹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单位,尽管其内部实行共产主义,但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它又能够与市场中的其他主体平等相处、通过市场机制自由竞争和自由交换,^③还通过以色列国家的市场与整个国际市场联结起来。基布兹内部生活的封闭性和对外交往的开放性,使其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封闭型小共同体的弊病,充分利用了市场经济的有利外部环境。例如,由基布兹发明的一些农业技术行销全世界,使拥有该技术的基布兹积累了巨额财富。基布兹实现了小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经济与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结合,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团镶嵌于自由市场的整体结构中,独立的集体经济单元纳入大市场的经济循环网络之中,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互补,这就与完全消灭市场或与市场完全隔绝的纯粹公有制经济模式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三) 犹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传统

犹太人由于犹太教信仰而积淀了深厚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犹太教是由部落宗教直接发展来的民族宗教,充溢着集体主义精神。耶和华是部落神,犹太民族集体成为上帝的“选民”,同样,他们也是集体犯罪,集体受到惩罚,将来还会集体得到拯救。即使个体或少数人犯罪,也是犹太人之罪,犯罪和赎罪都是集体行为。每人都背负着犹太人的罪,要为犹太人赎罪。犹太教还有实行公义、共济和慈善的传统,要求信徒救济穷人、扶助弱者、团结互助。保存《死海古卷》的艾赛尼派就是生活于公元前后的犹太教的一个派别,他们财产公有、集体劳动、共同生活,包括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基布兹仿佛是这一古老宗派在现代的复活。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犹太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与社会主义理想有契合之处。犹太人的弥赛亚信仰和长期受迫害的生存处境,也使他们在心

① Ichude Habonim, *In the Footsteps of Chaltzim*, Tel Aviv: Israel Press Ltd., Spring 1981, pp. 8—9.

② Henry 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A History, Volume II, Crisis and Achievement 1939—199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58—259.

③ Dan Leon, *Kibbutz: A New Way of Life*, London: Pergamon Press Ltd., 1969, pp. 43—44.

理上与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理想产生共鸣,痛恨不平等的现实,希望改变世界。这使得锡安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很容易汇流,成为许多犹太人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目标。^①而选择基布兹生活的犹太人只是其中较为彻底和激进的一部分。^②

犹太教使犹太人成为“律法的民族”。正统的犹太教徒至今仍需要遵守 613 条诫律,如恪守安息日、遵守严格而复杂的禁食要求等,宗教规范广泛渗入日常生活的细节。宗教规训培养了犹太人自律的习惯,有利于克己奉公、利他利群、相互合作的集体生活。犹太人强烈的宗教感情和对弥赛亚的祈盼,也使其对现世的物质追求比较淡漠,使世俗生活具有神圣性和服务于超验的追求。^③尤其对于宗教基布兹的建立者而言,他们来到巴勒斯坦是等待弥赛亚的降临,在对弥赛亚的期盼中展开世俗生活,圣化世俗生活。基于弥赛亚信仰,对世俗生活具有暂时性的观念,世俗生活不是建立尘世的天堂,而是等待天堂的过渡。世俗生活是等待,也是考验和磨炼,通过一种克己的、利他的集体主义生活,使自己更趋近于上帝。^④

犹太人的一神教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产生控制人的欲望、引导人生方向甚至部分地矫正人性的作用,至少在一部分虔诚的信徒身上是这样。即使在宗教观念比较淡漠的犹太人那里,数千年的宗教传统演化来的文化传统仍然会发挥作用。许多社会主义者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但由这种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形成的文化力量仍然对他们的人格和心理有塑造作用。这样,世俗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获得了传统宗教文化的有力支撑,而这种宗教和宗教文化对人影响的力度和深度,是纯世俗的意识形态无法相提并论的。

正是由于这种源自犹太人信仰的集体主义传统,基布兹先驱们得以克服世俗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内在张力,实现了锡安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姻。当 19 世纪末新一轮反犹主义浪潮兴起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认识到,犹太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才能根本解决犹太人问题。当基布兹先驱们怀着铸就新的犹太人集体认同的目的定居巴勒斯坦时,他们很自然地选择了带有浓重集体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理想,并将其与锡安主义传统结合起来,产生劳工犹太复国

主义运动,后者成为基布兹运动的意识形态主导。然而,社会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存在着张力。社会主义强调工人阶级的政治主导地位,而阶级概念则超越了特定的民族与国家的边界;犹太复国主义是民族主义概念,强调特定民族的政治主导和政治认同,天然排斥其他政治民族,也受限于特定的领土范围。这种内在张力充分地体现在劳工运动之中。^⑤此外,基布兹运动中的浪漫主义元素与社会主义也存在张力。^⑥尽管如此,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浪漫主义,共同在强大的犹太人集体主义传统中找到结合点,共同成为基布兹先驱们开拓巴勒斯坦的精神动力和信念来源。没有犹太教数千年来培养的精神传统,这些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很难彼此携手、引导共同的事业。

可见,基布兹成功的条件是非常特殊的。离开这些特定条件,基布兹便难以延续和发展。但是,社会在发展,基布兹的内外条件都在变化。在特定条件下能够成功的模式,在新的条件下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危机。随着基布兹模式的奠基一代退出历史舞台,整个以色列社会日益个体化,基布兹的信仰基础日益削弱,传统的集体主义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基布兹在迎接这些挑战的过程中,步入了后乌托邦时代。

三、后乌托邦时代: 基布兹模式的危机与转型

20 世纪 80 年代,以色列社会发生整体性的危机。基布兹受到牵连,大量基布兹工厂负债累

① 参见冯焱《以色列建国前的巴勒斯坦共产主义运动》,载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 年第 2 期。

② 参见饶本忠《犹太人与欧洲文明》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77—278 页。

③ 罗素曾言,“犹太人对于过去和未来历史的理解方式,在任何时期都会强烈地投合一般被压迫者与不幸者。”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447 页。

④ Yossi Katz, “The Religious Kibbutz Movement and Its Credo, 1935—48”,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1, No. 2, 1995, pp. 262—263.

⑤ Henry 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A History, Origins and Growth 1909—1939*,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43—140, 305—307, 359—361.

⑥ Aviva Halamish, “Kibbutz as Utopia: Social Success and Political Failure”, in Paul Lerner and Joes Segal (eds.), *Alternative Realities: Utopian Thought in Times of Political Rupture*, Washington D. 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2019, p. 84.

累,年轻一代对未来失去信心,成群结队离开基布兹,从而造成基布兹的经济和人口危机。^① 在这种压力下,各基布兹根据成员意愿,集体决定是否实行变革。最终,绝大多数基布兹从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公社,转变为部分承认个人主义原则、容纳部分财产私有制、实行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社会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社会。^② 大多数基布兹尽管仍然以集体主义为主导,但都朝着适应复杂社会环境、承认人性自利动机和允许个性自由发展的方向转型。

(一) 基布兹模式的危机

传统基布兹的成功得益于其特有的条件,但也面临所有乌托邦实验普遍遭遇的困境。首先,集体主义作为生产模式,与日益复杂多变的现代化经济生活存在矛盾。如果说纯粹集体主义的生产模式在简单的农业和手工业时代尚能发挥较明显的优势的话,那么在高度现代化的条件下,需要更加复杂、多变、高级和精致的生产和消费体系,后者建立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市场机制决定劳动力价值、对市场需求反应及时、个体创造性自由发挥的基础之上,这显然不是基布兹的长项。基布兹生产方式的集体主义原则,使其缺乏对市场的灵活反应机制和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机制,往往生产投入过高,不计成本,使得基布兹的生产能力和效率不再能够适应外部的需要。外部市场经济的复杂多变也让嵌入市场之中的基布兹的经济生活面临更大的风险,并最终在外部市场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负债累累、面临财政崩溃。^③ 市场环境曾是基布兹成功的因素之一,现在更复杂的市场机制则形成了迫使传统基布兹实行变革的压力。

其次,集体主义作为分配原则,与根深蒂固的个人自利动机之间存在矛盾。犹太人一直以来的宗教集体主义传统和基布兹先驱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使得基布兹先驱们能够克制内在的自利动机。但是,长期来看,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对人性的控制和矫正力量有一定的限度,最终还要对人性的力量作出让步。特别是在社会日益世俗化的时代,宗教的力量正在减弱。基布兹的彻底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之所以能够在过去取得成功,恰是因为在物质条件匮乏而精神状态饱满

的特殊时代,先驱们为了人人平等、自我劳动的理想而甘愿接受集体主义的分配方案将小我完全融于大我之中。但是,随着基布兹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整个以色列社会的现代变革,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能者多得的激励机制,弥漫于高消费社会中的享乐主义氛围,都对基布兹社会中能力较强(管理人、企业家和技术专家等)构成巨大的诱惑。个人的生产能力是导致他离开基布兹的重要原因,最有生产能力的人最可能离开基布兹。^④ 因此,在自由自愿的退出原则下,在有较大诱惑力的以色列社会环境中,个体更容易在自利动机的驱使下抛弃集体主义的平均分配原则,而追求更能体现个人劳动价值的市场机制。

最后,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与日益个体化的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之间存在着矛盾。在最初的年代,基布兹先驱们受到锡安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激励,轰轰烈烈的基布兹运动也带有浪漫主义特色。他们甘于奉献,不吝牺牲,追求平等、团体与和谐,克制自己的欲求,与同伴保持一致并融入社会整体。但是,随着先驱一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更年轻一代主导基布兹的发展,他们和父辈存在价值观念上的代际差异。如果说老一代在特殊的受压迫受歧视的条件下以锡安主义和社会主义为理想,而年轻一代则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较为安定和发达的犹太人国家和生存有保障的共产主义团体之中;如果说浪漫主义曾经激起父辈们对自然、土地、乡村和劳动的热爱,那么他们则是更为务实、更为现代化甚至具有后现代精神、追求个人享受和个性表现的一代,周围现代化的城市文明、后现代主义的个性表现,都对他们形成诱惑。基布兹尽管通过集体主义教

① Eliezer Ben - Rafael, "Kibbutz: Survival at Risk", in *Israel Studies*, Vol. 16, No. 2, 2011, p. 82.

② Raymond Russell, Robert Hanneman and Shlomo Ge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Kibbutzim", in *Israel Studies*, Vol. 16, No. 2, 2011, p. 109.

③ Amir Helman, "The Israeli Kibbutz as a Socialist Model", in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JITE) /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Vol. 148, No. 1,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astern European Reconstruction Problems (March 1992), pp. 172 - 176.

④ Ran Abramitzky, "The Limits of Equality: Insights from the Israeli Kibbutz", i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3, No. 3, 2008, pp. 1112 - 1113.

育试图使下一代延续其理念和生活方式,但这种教育却难以抗拒社会大趋势对年轻一代无所不在的影响。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新一代成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大量新移民的入住(通过婚姻或劳动关系),基布兹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集体主义精神逐渐淡漠,内在凝聚力下降,曾经促使基布兹创立、支撑基布兹克服重重危机的意识形态基础受到削弱。^①与此同时,现代社会日趋个体化,个人主义潮流日益强劲,伴随着以色列进入发达国家或后工业国家行列,其年轻一代较多秉持后物质主义或自我表现价值观,更注重个人精神价值的实现、个性的表现和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以色列社会虽然有犹太教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但仍然难以抵制社会个体化的大趋势。^②大环境如此,基布兹要生存发展,也只能在集体主义模式中融入更多个人主义成分。锡安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联姻渡过了他们浪漫的蜜月期,现在其必须走向更加理性、现实的阶段。

(二) 基布兹模式的转型

大多数基布兹为了应对危机,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在生产和管理方式方面,基布兹为提高生产效率,将生产活动与社群生活相区分,改变了传统上成员自动成为基布兹经济活动参与者和管理者的情形。基布兹建立独立的公司,聘请职业经理人管理,外部人员可以参与基布兹的经济事务,成为其雇佣工人和常住人口。在财产和分配制度方面,多数基布兹废除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普遍采纳差别工资制,每个人按能力和贡献参与分配。成员可拥有私人财产和基布兹分配的公寓,并且可以遗留给后代,甚至可以分得基布兹公司的股份,参与公司的利润分红。股份可以继承和出售,前提是基布兹保持对生产资料流通性的控制,但成员的日常生活开支由私人承担,如电费、餐费、差旅费,以及教育和医疗费用等。作为基布兹集体主义形象的公餐食堂大多也被废除,父母与儿童分开睡的育儿制度也被放弃,以往在公共场合集体参与的节庆活动(成人礼、婚礼等)都成为私人事务。在民主体制方面,全体成员参与的直接民主制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20—30位当选代表组成基布兹会议或代表议会,和通常由两人组成的社区管理员负责基布兹的日常事务。曾经的委员会和秘书处则从基布兹人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淡出。在对外关系方面更加开放,允许成员在基布兹之外学习和工作,只不过外出工作的成员要将收入上缴并从中领取相应的报酬,基布兹之外的人也能到基布兹工作。^③

绝大多数濒临崩溃的基布兹通过改革渡过难关,并且开创出更加灵活和多元的发展模式。在270多个基布兹(包括16个宗教基布兹)中,有大约73%选择变革,成为所谓“重建的基布兹”;有25%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的原则、理念和生活方式,被称为“公社基布兹”或“传统基布兹”;其余的则处于渐进改革的阶段。^④而且,为了兼顾平等与效率,实施激进变革的基布兹同时设立相应的平衡机制。例如,按照资历高低分配股份,以照顾年长者;设立“安全网”预算,以保障成员的最低收入;征收“共同体税”,以维持成员之间最低限度的平等。^⑤这样,变革并没有产生明显的贫富分化。改革后的基布兹仍然在生产资料方面坚持集体所有制,成员享有一定的受益权、继承权和有限的交易权,基布兹的“共有性”并未完全丧失。

总之,基布兹的变革弱化了其集体主义因素,扩大了个人主义的成分,个人、家庭获得更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基布兹整体上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走向了复兴之路。基布兹这种集体主义的公社并没有因为改革而衰落,而是走向多元化,成为以色列人在新的时代环

① Uriel Leviatan, “Kibbutzim as a Real – life Utopia: Survival Depends on Adherence to Utopian Values”, in *Psychology and Developing Societies*, Vol. 25, No. 2, 2013, p. 272.

② 一项对50个国家的分析表明,在个人主义指标得分方面,以色列与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高居前列。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③ Ronen Manos, “The ‘Renewed’ Kibbutz”, in *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on*, Vol. 32, No. 1, 2004, p. 38; Raymond Russell, Robert Hanneman and Shlomo Ge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Kibbutzim”, in *Israel Studies*, Vol. 16, No. 2, 2011, pp. 111 – 114; Uri Zilbersheid, “The Israeli Kibbutz: From Utopia to Dystopia”, in *Critique: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Vol. 35, Iss. 3, 2007, pp. 432 – 433.

④ Ronen Manos, “The ‘Renewed’ Kibbutz”, in *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on*, Vol. 32, No. 1, 2004, pp. 42 – 43.

⑤ Raymond Russell, Robert Hanneman and Shlomo Ge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Kibbutzim”, in *Israel Studies*, Vol. 16, No. 2, 2011, p. 111; Eliezer Ben – Rafael, “Kibbutz: Survival at Risk”, in *Israel Studies*, Vol. 16, No. 2, 2011, pp. 89 – 90.

境中探索新型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模板。城市中生活的基布兹青年,按照德加尼亚的模式,建立了数个“城市基布兹”;也有人用“生态主义”理念改造基布兹,为其注入新的活力。^①近年来,随着基布兹模式的成功转型,基布兹也迎来了经济繁荣和人口回流的趋势。改革后的基布兹经济效益稳步增加,全体基布兹的工业产值达到120多亿美元,为以色列贡献了5.2%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和9.2%的工业产量。基布兹农业产值达20亿美元,占以色列农业产出的34%,尤其是基布兹的科技产业成为引领其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第三支柱。基布兹所属的滴灌技术公司、装甲车制造、光学棱镜制造和塑料管道配件等公司,为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此外,基布兹成员的收入水平也大为改善,虽然69%的成员月收入只有2000多美元,但他们并不需要为住房和大多数服务支付费用,有11%的成员月收入达到或超过3500美元,绝大多数的成员都有很高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②随着基布兹经济的复兴,人口流失问题也得到解决。基布兹中安全舒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廉价的住房条件、有保障的生活,都引起一些人的羡慕,尤其是其成员之间亲密友爱、富有归属感的公社生活,对于缺乏归属感、寻求生活意义的原子化的城市人来说,具有独特魅力。^③在2008—2018这十年之间,基布兹人口从13.6万增加到17.91万。^④总体上,基布兹人口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高于1.9%的全国平均水平。^⑤

传统基布兹虽然存在,但基布兹的主流已经从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公社转型为以集体主义为基础,融入个人主义原则,公有制和私有制并行互补,按劳分配与平等共享相结合,扩大个人和家庭的自主性和生活空间,朝着社会主义甚至人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后的乌托邦社群。

四、结语

基布兹的百年发展历程中,从无到有、从小规模试验到大规模运动,从起源与发展到危机与变革,让人类见证了一场较为成功的乌托邦试验。当年激发基布兹先驱们投身这场试验的动机,已经随着时代的剧变而日渐模糊。基布兹模式的核心原则——集体主义——也在现代个人主义的潮流中失去了原来的绝对主导地位。锡安主义和乌

托邦主义的激情在消退,让位于更加理性和现实的选择。在以色列社会的带动下,基布兹朝着更加开放多元、更加尊重个人权利和个性表现的趋势演变。传统基布兹模式高扬集体主义旗帜、抑制个性发展、消除劳动分工、追求绝对平等和社团和谐的原则,在长期历史实践的检验中,越来越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人性自利的动机和追求个性表现自由的时代趋势相悖。但基布兹并非僵化的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和人口危机的压力下,绝大多数基布兹并未固守成规,而是解放人性、变革制度、自我维新。基布兹原来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多地融入了个人主义的元素,从而使基布兹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并在后现代社会的历史情境中展露出复兴的趋势。

基布兹模式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成功有其特殊性,但作为一个较为成功的乌托邦实验,其所遭遇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却具有普遍性。它告诉我们,社会个体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如何适应这个大趋势调整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建构合理的社会政治秩序,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对于一个遭遇困境的共同体而言,保持开放、适时改革、自我更新是应对危机的明智选择。只要人类仍然对未来怀有美好期待,乌托邦实验就永不会终结,理想追求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张力也就不会消失。基布兹人的理想主义精神值得敬重,而其顺应现实自我变革的发展经验也值得借鉴。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

责任编辑:文工

① Raymond Russell, Robert Hanneman and Shlomo Getz, *The Renewal of the Kibbutz: From Reform to Transformation*,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10–116.

② Shoshanna Solomon, “Claiming to Be Israel’s First Startup Ventures, Kibbutzim Jump on Tech Bandwagon”, in *The Times of Israel*, Dec. 31, 2017; Kibbutz Industries Association, “Kibbutzim”, see from <http://www.kia.co.il/infoeng/kibbutz.htm>.

③ Harriet Sherwood, “Israel’s Kibbutz Movement Makes a Comeback”, in *The Guardian*, Jul. 23, 2012.

④ Central Bureau Statistics, “Population –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Israel 2019 – No. 70”, see from https://www.cbs.gov.il/he/publications/doclib/2019/2.shnatonpopulation/st02_21x.pdf.

⑤ Maayan Lubell, “The New Rise of Israel’s Kibbutzim: More Young Families Opt for Communal Life”, in *Haaretz*, June 3, 2015.